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之演进

诸葛忆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古代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目标,日常生活与行为、日常思考与思想,都会围绕着那个时代的选官制度,历代的选官制度对文人乃至文学创作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两汉实行“察举制”,士人除才学能力之外,关键需要让外人熟悉自己的声名或才能,游历与拜谒就成为主要手段。“游子思妇”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主题。魏晋六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和品评成为选官的两大要点。门阀是确定的,品评却有高低优劣之分。六朝知识分子围绕着品评,就会有系列的作为。其时盛行玄言清谈,且佐之以山水,玄言诗和山水诗应运而生。唐朝实行科举制,科举制之独重进士科之倾向、“以诗取士”和纳卷、行卷制度的形成,推动唐诗创作长盛不衰,题材也全面扩大。宋朝科举改制,实行弥封等系列制度后,诗歌创作成就不如唐朝;考试内容渐重应策议论,带来文学创作中重议论、善议论的作风。明清科举重八股,与文学渐行渐远。

关键词: 选官制度;文学创作;影响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7)06-0067-13

“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惟一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就是出仕做官,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光宗耀祖。古代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目标,日常生活与行为、日常思考与思想,都会围绕着那个时代的选官制度。即:历代选拔官员的途径与制度,对文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影响至深。文学创作,作为文人思想特征、精神面貌的形象体现,集中地表现了特定时代文人的思维与行为的特点。换言之,历代的选官制度对文人乃至文学创作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

一、两汉察举制与游子思妇题材

先秦时期,古代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都在萌芽、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初始期。学者认为,战国时期官僚制度才初步形成①,这一时期大致处于世卿世禄制阶段。当时知识分子数量极少,从事文学创作者更少。况且,“学而优则仕”也还没有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惟一选择。所以,在这一时期,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两者之间并没有显示出来太多的关联性。

《论语·子张》载:“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经过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段,西汉最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独一无二的思想统治地位,“学而优则仕”亦渐渐成为古代知识分子惟一的人生道路选择。西汉以来,文学创作与选官制度的密切关系,日益彰显出来。

西汉确立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即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汉高祖曾下求贤诏:

>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

收稿日期: 2017-03-24
作者简介: 诸葛忆兵,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宋代科举文献资料长编”(项目编号:12XNL004)

① 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 页。

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①

西汉建国,便建立起察举制大致框架。而后,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察举制逐渐完善。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② 至此,西汉察举制基本完备,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

此外,直接上书朝廷,阐述政见,也有机会进入仕途。如,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③。又,终军"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④。

察举制度之下,士人除才学能力之外,关键需要让外人熟悉自己的声名或才能,方有机会获得荐举。寒窗苦读,面壁十年,与世隔绝,就完全不可能获得荐举的机会。士人必须通过相当的方式,弘扬声名,引起关注,其中,游历与拜谒就成为主要手段。上书朝廷,同样需要游历与拜谒。这样的风气,自武帝以后开始蔓延,两汉各举一例以见之:

(主父偃)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⑤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⑥

东汉以后,此风愈炽。"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⑦"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路,饥不暇餐,倦不获已。"⑧世风日下,察举变味,其间充斥着营私舞弊,《抱朴子·审举》云:"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⑨于是,游历拜谒、疏通关系、借助外力成为士人第一要务,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应璩诗云:"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⑩

再读《风俗通义》的一则记载:

太尉沛国刘矩叔方,父字叔辽,累祖卿尹,好学敦整,士名不休扬,又无力援,仕进陵迟。而叔方雅有高问,远近伟之,州郡辟请,未尝答命,往来京师,委质通门。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阔,为之先后,叔辽由此辟公府博士,征议郎。叔方尔乃翻然改志,以礼进退,三登台衮,号为名宰。⑪

刘矩乃东汉名臣,号为贤相,《后汉书》有传。刘矩长辈"士名不休扬,又无力援",必然"仕进陵

① 《汉书》,卷一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1页。
② 《汉书》,卷六,第160页。
③ 《史记》,卷一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5页。
④ 《汉书》,卷六四下,第2814页。
⑤ 《汉书》,卷六四上,第2798页。
⑥ 《后汉书》,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43、1644页。
⑦ 《后汉书》,卷四九,第1630页。
⑧ 徐幹:《中论·谴交》,林家骊:《徐幹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38页。
⑨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一五《审举》,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93页。
⑩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3页。
⑪ 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4页。

迟”。刘矩“雅有高问,远近伟之”,才有“州郡辟请”、二公“为之先后”,刘矩由此“三登台羁,号为名宰”。《后汉书》载:“矩少有高节,以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拜议郎,矩乃举孝廉。”①刘矩长辈的出仕得官,获益于刘矩的声名。

明了两汉察举制下形成的士人热衷漫游之世风和“处士纯盗虚名”②之士风,就会对《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有更加深入的体会。《古诗十九首》的核心话题就是“游子思妇”,正是这种“冠盖填门,儒服塞路”之奔波劳顿的心路历程之展现。

>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③

这是以居家妻子的口吻抒写对飘零在外丈夫的思念之情,语言质朴晓畅。然却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段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如点化前人诗语、比喻、夸张等等,离别相思之情被写得细微而生动。结句对丈夫的体贴关心,是直接学习了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古诗十九首》反复吟唱着这一主题:“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游宦途中,他们当然会表现对功名利禄的极端热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得不到荐举,他们就会有种种怨言:“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或者会有知音难觅的感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长年游历拜谒失败,又会产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等颓废情绪:“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察举制背景下文人的生存常态角度考察,《古诗十九首》的系列主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读。

再将视野拓展到两汉其他文学创作,游子思妇也是最为常见的主题。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题与《行行重行行》完全一致,开篇即云:“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再举两首汉乐府为例。《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古歌》云:“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游子的悲苦情绪郁积到无法抑制、倾泻而出的地步,感情极为强烈。游子长期离家,对家人与家乡的思念无日不萦绕于心头。思念已极,只能以远望来排解,但是,远望永远不能“当归”,引起的是更多的苦痛。思乡泪已流尽,只能以悲歌倾诉内心情感。后一首诗人用肃杀凄寒的秋风作背景,强化了抒情效果。诗歌的语言极其质朴,感染力却很强。《文选》所载七首所谓李陵、苏武诗,主题皆为游子思妇,所谓“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如云:“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之送别,“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之相思,皆情真意切,入木三分。

同样一个主题,在两汉不同时段、不同作家手中反复出现,成为那个时代表达最为频繁的话题,其共同关联性或深层原因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古诗源》录入《古诗十九首》后,简评云:“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④将作者身份首先确定为“逐臣”,就是没有将上述创作与察举制联系在一起阅读而产生的误

---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76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二上,第 2725 页。

③ 沈德潜:《古诗源》,卷四,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88 页。以下《古诗十九首》与其他汉代诗歌皆引用此版本,不再出注。

④ 《古诗源》,卷四,第 92 页。

解。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比较确切地解读了这系列作品的背景,说:当时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①可惜没有将这种现象联系到当时的选官制度,没有给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象。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很好地阐述了《古诗十九首》所展现的"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②,同样没有揭示何以如此的原因。其他文学史研究者认识或者更加模糊,他们强调"东汉中后期那个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文人们寻找不到"人生的出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这时在他们心中显得更为强烈",由此"展开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劝慰、愿望……等各项内容"。③ 似是而非,完全没有理解选官制度作用下所形成的世风与士风对文学创作之影响。

二、六朝九品中正制与玄言山水题材

东汉末年,察举制走向穷途末路,后来当政者不得不有所改变。翻检《汉书》《后汉书》列传,很容易发现:两汉获得荐举进入官场的大都是官宦子弟。学者通过统计,得出以下结论:东汉察举"几乎全被上述的士族集团所垄断,一般寒族进身之望微乎其微"。④ 这在先秦贵族世卿世禄制下发展而来,且始终是"官本位"的两汉专制社会体制中,上述现象是必然的。"权门贵仕,请谒繁兴"⑤,已是东汉以来的普遍现象。不同级别官员的子弟,获得荐举的机会和力度都是不一样的。东汉末年,察举制的话语权实际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察举制中,已经有了九品中正制的大致轮廓。

曹魏时期,察举制依然存在,然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黄初元年(220),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朝廷设置各级中正官,专门负责品评人物,品评的最主要标准是家世门阀,同时要顾及个人行状,所谓"家世"和"德才",以九品确定人物。九品中正制下,门阀世族掌握了选举权,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背景下,门阀和品评成为选官的两大要点。门阀是确定的,品评却有高低优劣之分。六朝知识分子围绕着品评,就会有系列的作为,《世说新语》便是这系列作为的实录。《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品评人物,大致涵括了六朝品评士人的各个角度,因此形成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在实际操作中,对人物的品评更加简化,并没有如此详尽的分门别类。即:人们以当代盛行的世风和士风来品评人物。六朝士人,由此趋同当代世风与士风,文学创作特色也因此形成。

六朝盛行玄言清谈,《文心雕龙·论说》云:"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⑥魏晋时期,距西汉"罢黜百家"时间较近,儒家在思想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还没有牢固树立。竹林七贤等士人以老庄玄学对抗司马氏,外庄内儒,儒家在某种程度上退居次位。两晋时期承袭此风,老庄玄学继续盛行。然而,这时段"玄学主要只是一种沿袭的文化行为方式和士大夫的时髦风气。……魏末玄学家谈玄重在辨析'玄';西晋玄学家则偏于表现'谈',通过谈玄表现名士风采"⑦。由此,善玄言清谈者易得美官。《世说新语·文学》载:

>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4 页。
②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8 页。
③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0 页。
④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 页。
⑤ 《后汉书》,卷六一,第 2042 页。
⑥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27 页。
⑦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9 页。

> 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①

崇尚玄言清谈,很快对文学创作形成影响,西晋后期玄言诗逐渐流行。《文心雕龙·时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②《诗品序》亦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③这里举出的玄言诗代表作家是孙绰和许询,以孙绰为例。孙绰有《赠温峤诗》五章,读其中二首:

> 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
>
> 既综幽纪,亦理俗罗。神濯无浪,形浑俗波。颖非我朗,贵在光和。振翰梧摽,翻飞丹灵。爰在冲龀,质嶷韵令。长崇简易,业大德盛。体与荣辞,迹与化竞。经纬天维,翼亮皇政。④

孙绰自我评价,便以清言玄咏自傲:"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⑤《文心雕龙·明诗》将孙绰与袁宏并提,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⑥孙绰为一时玄言诗代表人物,在当时是获得公认的。然而,品读上述两首作品,既无哲理思辨的深度,又无文学审美的愉悦,玄言诗得以流行,足以见出九品中正制下重门阀和品评,已经将文学创作导入歧路。

另一位玄言诗的代表人物许询,居然没有完整的玄言诗流传至今,可以说明读者的审美选择。许询留存至今的诗歌片断,大抵离玄言较远,略有文采,下文还将提及。

老庄的志趣乃清静无为、回归自然,故其倡言隐逸,偏重山水。于是,山水风景在玄言和士人生活中就占有相当的位置。况且,玄学家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和变化都能体现"道"和"理",或者干脆就是"道"和"理"的衍化派生。所以,两晋士人谈玄时,往往借助山水说明理趣。《世说新语·赏誉》载:"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⑦孙绰认为山水与作文关系最为直接,才有此评说。孙绰《赠谢安诗》云:"幽源散流,玄风吐芳。芳扇则歇,流引则远。朴以凋残,实由英翦。……青松负雪,白玉经飚。鲜藻弥映,素质逾昭。"便有借景说理之意。孙绰《兰亭诗》其二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创作重心完全转移到山水风景,"微言剖纤毫"、"忘味在闻韶"方略略有玄言之意。许询存今诗只有三残句,残句一云:"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当为玄言中之写景。

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中言山水风景的句子颇值得吟咏回味,故六朝士人酷爱山水。而且,"散怀山水,萧然忘羁"⑧,正是魏晋名士风流之一种。六朝士人几乎所有的审美热情,都在山水之间得到了释放。除了玄言诗中时时点缀的山水句子之外,其他文体中多有山水描写。尤其是相互之间的通信,不乏全篇都写山水者,如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等。举

---

①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28、129 页。
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 675 页。
③ 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 页。
④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三,第 897、898 页。以下所引六朝诗作皆引用此版本,不再注出。
⑤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 285 页。
⑥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 67 页。
⑦《世说新语校笺》,第 261 页。
⑧ 王徽之:《兰亭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三,第 914 页。

后一篇为例:

>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①

书信中没有寒暄客套,其目的就是为了述说得山水之乐,可见六朝士人对山水之沉湎。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山水诗应运而生。六朝山水诗,何尝不是以山水来映证玄言!谢灵运山水诗大都以玄言结束,前文的山水景色都成了最后玄言之映证。其《登池上楼》云:

>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从"潜虬媚幽姿"到"褰开暂窥临",都是诗人在叙述自己生活的现实情景。"倾耳聆波澜"至"园柳变鸣禽"六句才是山水描写,最后用以证明"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之玄言。这阶段的山水诗,山水描写成分在诗中只占一定比例,诗人似乎是换种方式在玄言清谈。谢灵运诸多山水诗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其《登江中孤屿》结云:"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结云:"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结云:"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甚至陶渊明部分田园诗,也不脱此种模式。《饮酒》其五结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园田居》其四结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连雨独饮》结云:"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玄言为主体,山水为点缀,即是玄言诗;山水为主体,玄言为点缀,即是山水诗。玄言与山水,乃一奶同胞,都可以追溯到世风士风、人物品评、九品中正。王瑶先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才提出:"'老庄'其实并没有'告退',而是用山水乔装的姿态又出现了。"②

三、唐朝科举制与诗歌题材的全面拓展

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朝。隋立朝短暂,旋归灭亡,且科举制尚处初始阶段,故隋朝科举制还没有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唐朝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首先,唐朝科举制之考试内容和录取重点的改变,导致唐诗创作的全面繁荣。具体地说,唐朝进士科"以诗取士"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唐诗繁荣的进程基本一致。这里需要强调一句,唐人科举考试,独重进士科。《唐摭言》卷一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③

唐初进士科,仅试时务策。《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国初,……进士试时务策五道。"④《通典》卷十五亦载:"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⑤"试文"或称"试杂文",《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⑥"杂文"两篇,最初并不确定文体,《登科记考补正》卷二按云:"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

---

①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305 页。
②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2 页。
③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 页。
④ 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5 页。
⑤ 杜佑:《通典》,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354 页。
⑥ 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第 16 页。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乙丑,改元开耀,两书所载皆指公元 681 年。

赋,当在天宝之季。”①即:一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所试“杂文”两篇,才逐渐确定为诗与赋。其时,甚至有“赎帖”一说。《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②帖经也被试诗所替代,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和录取重点至此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即:进士科考试惟重诗赋,是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形成的。

盛唐诗歌创作高峰,正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不是一种巧合。转换到科举制度演变的角度观察唐诗兴盛史,就会有独到的认识。唐朝不到三百年,初唐诗坛约百年时间,占三分之一强,而著名诗人寥寥。初唐有王绩、初唐四杰、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等,东晋南北朝也有谢灵运、陶渊明、鲍照、谢朓、庾信等等,两相比较,初唐诗坛之繁盛并未超越前代。唐初科举制进士科考试不考诗赋,对文学创作几乎没有影响,诗歌创作大致沿袭前人,其成就亦无法超越前人。开元、天宝年间,唐诗创作进入全面繁盛的阶段,人称“盛唐”。李白、杜甫、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盛唐边塞诗派,一时风起云涌,诗人林立,名篇迭出。这与进士科考试内容与重点的转移大致同步。前人或言初唐诗坛之积累,导致盛唐诗坛之繁荣,此话大致不错,不过是废话一句。是否文学创作积累越多,后世创作成就越大? 这是无须回答的问题。如果进一步追问:初唐何以要积累如此之久? 在开元、天宝这个时段节点诗坛何以发生巨大变化? 从选官制度改变的角度分析,能够得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考试惟重诗赋,唐人因此形成文学创作是通往功名利禄最重要途径的观念。列举如下:

> 梁肃《李史鱼墓志铭》:开元中,以多才应诏,解褐授秘书省正字。时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③
>
> 独孤及《顿丘李公墓志》:开元中,蛮夷来格,天下无事,缙绅闻达之路惟文章。④
>
> 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自开元、天宝间,万户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隧。⑤
>
> 杜佑《通典》: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⑥

这样的观念,屡屡见诸唐人言辞。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称作者“以词学登科”⑦,《唐摭言》卷四称朝廷“设文学之科以待英俊”⑧。或有直接点明诗歌创作才是科举录取的关键因素。李嘉祐《送冷朝阳及第东归江宁》云“高第由佳句”⑨,方干《赠李郢端公》云“别得人间上升术,丹霄路在五言中。”⑩杜牧《登池州九华峰寄张祜》云:“谁人得似张公子? 千首诗轻万户侯。”⑪

其次,唐朝科举制下形成的纳卷、行卷制度,最大程度地推动了诗歌创作之繁荣。唐朝科举考试没有弥封制度,考官直接面对考生。同时,仅靠考场短暂比试而决定考生前程的方式确实也存在不合理性。例如,贾岛《题诗后》自言:“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假设让贾岛这样的“苦吟”天才诗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五言排律十二句,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以命题的方式写诗,天才与庸才的表现相差无几。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

> 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首韵拘于见题,

---

①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4、85 页。
② 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第 16 页。
③ 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五二〇,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289 页。
④ 《全唐文》,卷三九一,第 3980 页。
⑤ 《全唐文》,卷五〇〇,第 5096 页。
⑥ 《通典》,卷一五,第 357 页。
⑦ 颜真卿著、黄丰骥编订、凌家民点校:《颜真卿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 页。
⑧ 《唐摭言》,卷四,第 46 页。
⑨ 《全唐诗》,卷二〇六,第 2151 页。
⑩ 《全唐诗》,卷六五二,第 7486 页。
⑪ 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7 页。

> 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王昌龄《四时调玉烛诗》云:“祥光长赫矣,佳号得温其。”钱起《巨鱼纵大壑诗》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骐骥长鸣诗》云:“逐逐怀良驭,萧萧顾乐鸣。”李商隐《桃李无言诗》云:“夭桃花正发,秾李蕊方繁。”此等句与儿童无异,以此知省题诗自成一家也。①

为了弥补科举考试过程中此种不足,天宝元年(742)礼部侍郎韦陟知贡举,针对性地采取了“纳卷”的措施。《旧唐书》卷九十二《韦陟传》载:“陟好接后辈,尤鉴于文。虽辞人后生,靡不谙练。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②此后,朝廷效仿这种做法,大约在天宝年间形成制度。所谓“纳卷”,就是指唐朝考生应省试之前,选择自己的优秀作品交纳给主试部门,由主试官们先行过目。

“纳卷”制度依然有两个不可避免的弊病。第一,唐朝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每人选优秀作品十多首,总共就有一万多首作品。让主试官在有限的时间里,认真读完这么多作品,并加以甄别,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第二,如韦陟这样“尤鉴于文”的主试官毕竟不多。考生因此自寻出路,“行卷”应运而生。“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③与此相关,尚有“温卷”一说。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载:

>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④

与纳卷、行卷等相关,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公荐”“通榜”等做法。即: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向主考官公开推荐考生,考前就决定录取名次。杜牧的考试经历就非常具有典型性。《唐摭言》卷六载:崔郾是年知贡举,太学博士吴武陵持杜牧《阿房宫赋》向其推荐:“‘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比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⑤“公荐”和“通榜”的依据,就是考生的行卷。考试名次,往往考前决定。在如此科举选官制度背景下,唐人不会写诗,便是自绝前程。况且,唐朝进士科考试录取名额极少,每年多则数十人、少则七八人。“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⑥年年投考,需要不断纳卷和行卷。李商隐《与陶进士书》描述自己当年赴考经历,云:“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⑦岁岁纳卷、行卷,必定有新作补充更替。所以,唐人需要不断写诗,乃至终生殚精竭虑,努力推陈出新,打磨出精品。中唐“苦吟”诗风之形成,即得力于纳卷与行卷之风。

唐人如果不会写诗,便得挖空心思,另辟蹊径。举二例以见之:

> 杨衡后因中表盗衡文章及第,诣阙寻其人,遂举,亦及第。或曰:见衡业古调诗,其自负者,有“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颇愤怒,既而问曰:“且‘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

---

①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3、44 页。
② 《旧唐书》,卷九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958、2959 页。
③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0 页。
④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抄》,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35 页。
⑤ 《唐摭言》,卷六,第 63 页。
⑥ 《唐摭言》,卷一,第 5 页。
⑦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34 页。

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①

李播以郎中典蕲州,有李生携诗谒之。播曰:“此吾未第时行卷也!”李曰:“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游江淮间二十馀年矣。欲幸见惠!”播遂与之,因问何往,曰:“江陵谒卢尚书。”播曰:“公又错也,卢是某亲表。”李惭悚失次,进曰:“诚若郎中之言,与荆南表丈一时乞取。”再拜而出。②

去偷去骗,也得拿出像样的诗作行卷。唐代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被挤向这座独木桥,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智慧都投入到诗歌写作中去。唐朝自开元、天宝以来,诗歌长盛不衰,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唐朝因选官制度而造就的诗歌热潮,影响广泛而深远。

其一,社会各阶层对诗人和诗歌有特别的喜爱和崇拜。唐代流传甚广的“旗亭赛诗”故事,最能说明问题: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唯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③

其二,唐代宫廷和地方官府,也要举行种种赛诗会,对诗歌创作之热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隋唐嘉话》卷下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④又,《唐摭言》卷二载:“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祜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无奈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⑤诗作出色,前程似锦,飞黄腾达,诗才与功名利禄密切关联。吴乔《围炉诗话》卷四云:“事之关系功名富贵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贵在诗,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变。一不自做,蹈袭前人,如今日之抄旧时文,便为士林中滞货故也。”⑥

唐人日常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寻觅诗材和写诗的灵感。李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它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⑦ 贾岛“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⑧ 唐人如此醉心迷恋诗歌写作,从盛唐以来已经形成风气。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

---

① 《唐摭言》,卷二,第19页。
② 《唐诗纪事》,卷四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721页。
③ 薛用弱:《集异记》“王之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2页。
④ 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页。
⑤ 《唐摭言》,卷二,第17、18页。
⑥ 吴乔:《围炉诗话》,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98页。
⑦ 《新唐书》,卷二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88页。
⑧ 《新唐书》,卷一七六,第5268页。

惊人死不休。”《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又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中唐以后诗人变本加厉。孟郊《夜感自遣》云:“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卢延让《苦吟》云:“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茎。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此类事例或诗句,举不胜举。

所以,日常生活的一切题材,只要能够触发诗人灵感,都可以入诗。生活中的诸多感受,唐人也习惯拿最熟悉的文体形式诗歌来表达。元稹称赞杜甫诗歌已臻至“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①的境界,任何题材和情感都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进入仕途之后,唐人也随心所欲地以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如陈子昂之《感遇》、白居易之《新乐府》等等。唐朝科举制下所形成的“以诗取士”之倾向,导致诗歌题材的全面拓展。

或有学者以唐朝省题诗无佳作之理由,认为唐朝科举制度没有对诗歌创作起到促进作用。这是一种狭窄的错误认识。这种观点忽略了两种事实:第一,考场虽无佳作,唐人为进出考场而花费的学诗、写诗之时间和精力都是巨大的。具备了十分扎实的作诗基本功,一旦遇到合适的题材,一旦灵感激发,就有佳作源源不绝地出现。第二,唐朝科举实行“纳卷”“公荐”等制度,往往科举录取名次考前便确定。于是,考前的“纳卷”“行卷”成为登科的关键因素,而优秀的诗歌是“纳卷”“行卷”的必备利器。“以诗取士”当然包括这一系列制度。

四、宋朝科举改制和文学转型

宋朝沿袭唐朝,以科举取士,独重进士科。然而,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是由宋朝建立的,明清科举大致承继宋朝制度。宋朝科举改制,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个方面:其一,建立起弥封、誊录、编排、锁院等制度,确保以考试卷面成绩为录取依据,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考场公平公正原则之落实。其二,考试内容由重诗赋转向重策论。

唐代纳卷和行卷在“以诗取士”过程中之所以发挥重要作用,关键点在于科举考试采取不封弥考生姓名的做法,主试官面对考生姓名直接确定录取名单及名次。北宋真宗年间,科举制度有了重大变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糊名制和誊录制。糊名,又称封弥、弥封,即糊去试卷上考生姓名等个人信息,以号码作为试卷的编号。景德四年(1007),真宗“命知制诰周起、京东转运使祠部员外郎滕元晏封印举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道监封印院门。进士、诸科试卷,悉封印卷首,送知举官考校,仍颁其式。知举官既考定等级,复令封之进入,送复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凡礼部封印卷首及点检程试别命官,皆始此”。② 与此相关,朝廷派遣专门人手,将考生试卷重新抄录,以免考生笔迹被认出,此为誊录制。《宋史·选举志一》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始置誊录院”。至此,比较完善的糊名、誊录制都已经建立。

与此关联,又有编排制、锁院制等。编排,指弥封过程中的编号。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内出新定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弥封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复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③ 锁院,指朝廷公布考官名单后,考官们立即进入考试场所——贡院,不再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才离开贡院。这项制度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这一年的正月六日,“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④

考官无法知晓考生姓名,纳卷、行卷、公荐等制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宋代科场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⑤,努力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的种种影响,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

---

① 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601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512 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第 1740 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第 733 页。
⑤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69 页。

和行为模式。

宋代士人由此转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之闭门苦读,反复揣摩试题类型,模拟写作。“苦读才疲即伏枕”①“知有人家夜读书”②“闭门读书声琅琅”③“闻向秋山苦读书”④,此类叙说,时时可见。真宗《劝学文》所言:“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所倡导的就是闭门苦读。

闭门不出,就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阅历,缺乏创作的激情。模拟省题诗之作,当然与性灵、性情无关。宋人再也不需要时时面对现实生活,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宋诗总体质量不如唐诗,首先是因为科举制度的演变,宋人并未将更多的聪明才智投向诗歌创作。宋人共同将唐宋诗创作成绩的差异归之于科举制度。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⑤杨万里亦云:“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⑥

宋太宗以后,大量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考试内容与为官品质和资质之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朝廷上下的关注,宋人开始不断质疑“诗赋取士”。孙何言:“策论高者,稍近于仁义;诗赋精者,未离于雕篆。今朝廷取士之制虽古,用道较艺之术,犹专守唐代。”⑦马亮也给太宗进言:“诗赋小才,不足观士,愿先策论,以擢优长。”⑧真宗咸平五年(1002),张知白上疏,提出:进士考试“先策论,后诗赋,责治道之大体,舍声病之小疵。”⑨由此,朝廷上下逐渐达成共识,进士考试中策论地位日益加重。大中祥符元年(1008),冯拯要求:“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⑩得到真宗首肯。天禧元年(1017),真宗再次对宰辅强调:“前已降诏,进士兼取策论。”⑪进士考试录取标准的逐步改变,在宋仁宗年间有了明显的表现。“天圣二年,刘筠知贡举,得公(叶清臣)所对策,奇之,擢为第二。国朝以来,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⑫天圣五年(1027),朝廷下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⑬从太宗到仁宗,进士考试中慢慢形成了诗赋与策论并重的局面。

既然诗赋与官员的道德品质、行政能力无关,策论一步步获得朝廷重视之后,要求独重策论的讨论也就出现了。庆历初,富弼《上仁宗乞革科举之法令牧守监司举士》言:“欲今后科场考试,以策论为先。”⑭范仲淹庆历年间变革朝政,对科举的要求也是“先策论而后诗赋”⑮。这种观点,几乎得到多数大臣的赞同,赵师民、宋祁、欧阳修都给朝廷上疏,表达同样的看法。

神宗熙宁变法,科举改革乃其重点之一。熙宁二年(1069),朝廷下诏,要求大臣讨论“贡举法”之变革。韩维认为:科举考试“诱之以华靡无

---

① 王令:《寄李常伯满粹翁》,《全宋诗》卷六九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086 页。
② 晁冲之:《夜行》,《全宋诗》卷一二二七,第 13893 页。
③ 吕本中:《尹穑少稷方斋》,《全宋诗》卷一六二三,第 18214 页。
④ 林希逸:《七月二十三日奉寄濑溪书堂吴景朔因讯旧游》,《全宋诗》,卷三一二四,第 37323 页。
⑤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7 页。
⑥ 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八三《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337、3338 页。
⑦ 孙何:《送朱严应进士举序》,《全宋文》第 9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9 页。
⑧ 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全宋文》第 19 册,第 234 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第 1169 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第 1522 页。
⑪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〇,第 2082 页。
⑫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57 页。
⑬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五,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4269 页。
⑭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八〇,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865 页。
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第 3436 页。

用之文,程之以诵记不讲之言”,因此要求“罢诗赋”①。王安石认为:“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②司马光建议:“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③吕公著亦云:“取人以言,固未足见其实;至于诗赋,又不足以观言。是以昔人以鸿都篇赋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识者皆知其无用于世也。臣以谓自后次科场,进士可罢诗赋,而代以经。先试本经大义十道,然后试以论策。”④诸人所议,大致相同。皆以为科举应该罢试华靡不实之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司马光更为激进,甚至要求废除诗、赋、论,独存策问。

熙宁三年(1070)进士正奏名和特奏名殿试,首次采用制策问答的方式考试,其做法与以往的制举殿试相同。“旧制:殿试进士以诗、赋、论,特奏名进士一论。至是,进士就席,有司又犹给《礼部韵》。及试题出,乃策问也。上顾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 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⑤《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八载:

> 公(吕公著)知贡举,在贡院密上奏,曰:“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专用策论。今来廷试,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诏策,咨访治道。”是岁,上临轩,遂以策试进士。⑥

吕公著密奏,帮助神宗最后下定决心。此后,或诗赋取士,或经义取士,省试内容时有变化,而殿试以策取士,大致沿袭不变。熙宁以后,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问的写作上。叶适言:“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⑦

殿试应策,全篇议论,宋代科举由唐人的“以诗取士”转向“策论取士”。况且,熙宁三年之前的制科考试号称“大科”“第三等与进士第一……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⑧ 地位远比进士科考试重要。制科最后录取也是取决于应策议论,宋朝科举重议论的特点在北宋真宗、仁宗年间已经逐步形成。在这样的科举风气转移背景下,宋代文学好议论的特点逐渐凸显。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苏轼诗歌,即说:“子瞻以议论作诗。”⑨《沧浪诗话》称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⑩,就是对这种创作风气转变的经典归纳。闭门苦读,以博览取胜,“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便与此相关。宋诗中议论名篇名句比比皆是。范仲淹《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云:“一棹危于叶,旁观亦损神。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王安石《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苏轼《题西林壁》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陆游《关山月》云:“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宋诗屡屡被后人诟病的,也集中在这个方面。杨慎《升庵诗话》卷一称:“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人们通常认为,议论是散文笔法,诗歌则以抒情为主。明人屠隆说:“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⑪其实,具体到宋人的散文,其喜欢议论的成分也要远远超过前人。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旨趣在山水风景,个人的情感或心境也总是通过山水景色的描写折射出来。宋代的山水游记,往往喜欢通过景色浏览来揭示一种理趣。如苏轼的《石钟山记》最后得出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游历石钟山的见闻,使作者领悟了一种生活哲理。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最后引发出来的也是大段议论:

>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

---

① 韩维:《议贡举状》,《全宋文》第 49 册,第 154 页。
② 王安石:《乞改科条制札子》,《全宋文》第 64 册,第 20 页。
③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三九《议贡举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91 页。
④ 吕公著:《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八,第 853 页。
⑤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九,第 4365 页。
⑥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⑦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三《制科》,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802 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第 4540 页。
⑨ 陈应鸾:《岁寒堂诗话校笺》,成都:巴蜀书社 2000 年版,第 36 页。
⑩ 《沧浪诗话校释》“诗辨”,第 26 页。
⑪ 屠隆:《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7 年版,第 1172、1173 页。

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①

王安石通过观赏景物等游历,明白的也是人生哲理。宋人之作与前人的山水游记迥然有别。

即使花前月下以抒情见长之宋词,也不乏议论名句。柳永《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苏轼《念奴娇》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秦观《鹊桥仙》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至辛弃疾更是形成“以文为词”的创作特征,将议论手法在歌词创作中运用得淋漓尽致。

明清科举制度沿袭宋朝,进士科考试内容由经义、策论转向八股,与文学渐行渐远。文人们之苦读、赶考、落第、高中等过程中之心路历程,仍然会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得以展现,尤其是在新兴文体小说中得以展现。今人已有详尽论述②,本文不再赘述。

The Evolution of the Officials Selection System and Literary Creation

Zhuge Yibi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ince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desired to realize their worldly ideal of “studying well so as to become an official”, they would definitely have their daily lifestyle and behavior, and their daily thinking and ideas involved with the officials selection system of their times. The officials selection systems of various dynastie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intellectuals, and even o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Han Dynasty,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察举制) was put into effect. Accordingly, besides the learning ability and talent, it was really crucial for intellectuals to make their reputation and talent well known. And travelling across the country and visiting high officials became important ways for their promotion. Therefore, the experiences of wanderers and the regretting of their wives (游子思妇) became literary theme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nine-rank system of officials selection by evaluation (九品中正制) was carried out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family status and social evaluation became two key points of this officials selection system. The family status of a person was fixed, but evaluation for him varied a lot. So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Six Dynasties made their efforts to do a series of performances for attaining a good valuation. Metaphysical poems and scenic poems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put into effect, which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examination for metropolitan graduates (进士), selected scholar-officials by their poem writings,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a system in which the provincial graduates (举人) presented their daily writings to the examiner in charge of the examination for metropolitan graduates (纳卷), and the provincial graduates presented their essays and poems to the well – known high officials (行卷). The above practices caused the creation of poems to prosper for a long tim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expanded the themes of poetic writings. A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reformed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such a series of new rules were formulated as the sealing of the examinee's name on his examination paper (弥封), Song poetry failed to make a high achievement as Tang poetry did. As the examination content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discussion of coping strategies, it formed the style of focusing on discussions in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tereotyped writing of eight-part essays (八股) was given priority to, which went far away from literature.

Key words: officials selection system, literary crea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全宋文》,第 65 册,第 51 页。

② 详见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及郭万金:《明诗文学生态研究》,第四章《科举制度下的诗歌取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